

第一章 同性恋的历史发展和艺术传统

边静

作者赐稿

—

第一节 同性

恋：一种社会现象

同性恋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性欲取向和性行为。同性恋、同性恋者，这些名词是伴随着人类工业化才出现的。在工业化之前，西方社会对此还很陌生。现在常被使用的同性恋词语“gay”，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除了警察和戏剧界等少数人以外，这个词在同性恋圈子外面基本上还是无人知晓”

[1]。在华人文化圈内流行的“同志”称谓也只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从香港开始使用的。但是，同性恋现象是普遍存在而且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表明，有人类居住的每一块大陆上从远古时代就存在同性恋现象。例如古埃及人、古希腊人把男性间的性爱行为看成是神圣的事；玛雅文明对同性恋很宽容，认为是天性使然；大洋洲的一些美拉尼西亚部落把同性性行为视作青少年的成人化仪式，并保留至今。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同性恋者是人口中的少数派，社会学家的调查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同性恋人口占总量的 10% 以下。中国的同性恋数量，大致在 3%~4%，其下限在 2%~3%。虽然这个比例不是太大，但人口的绝对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在中国至少有 3000 万同性恋者。在世界范围内，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被长期忽视，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同性恋的研究调查，使同性恋现象逐渐清晰起来，虽然很多问题尚无定论，但是一种对同性恋的科学态度渐渐在社会中树立起来。

一、同性恋的成因

在同性恋电影中，一些情节描写了同性恋者儿时的家庭生活状态、青少年时的第一次性经历等，试图反映同性恋的成因。事实上，造成和影响同性恋的因素相当复杂，应当予以深入探讨和研究。而对同性恋成因的了解，当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些影片。

从目前研究状况看，生命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都对同性恋作出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还没有一种权威的定论。关于同性恋成因的理论可以归结为

三种观点：一是先天说。很多同性恋者自认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谓“树各有枝叶，人各有性情”，一些人在四五岁时就对同性有着莫名其妙的好感并产生性兴奋。法国同性恋电影《玫瑰少年梦》[2]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科学家从遗传、激素、大脑结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遗传基因、胎儿期母体的雄雌两种激素的比例、大脑某些区域的结构特点在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存在差异。这些研究仍在继续，尚无定论，但是逐渐为大家接受的是同性恋的成因有其生理因素。二是后天说。它关注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是成长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和教育对同性恋形成的影响。这一观点又分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学派。前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同性恋的成因，男性在儿时与某个女人，通常是母亲，保持了过于亲密的关系，并模拟这个女人，而以自己（同性）为性对象。在家庭关系中，通常是母亲的形象和影响远远大过父亲，所以儿子在青春期后会寻找一个具有父亲身上没有的“男性力量”的人作为伴侣。行为学派主张同性恋行为是受环境影响而后天习得的。童年时的性别认同错误可能导致同性恋，比如长期和异性伙伴玩耍，反性别的抚养教育，都可能让儿童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与生理性别的差异。第一次性经历对个体性取向的影响很大，许多同性恋者第一次受人引诱或者在其他情形下发生同性性行为，从而“欲罢不能”。异性恋交往的挫折和乱伦经历也会促成同性恋取向。正是从这些理论出发，同性恋的防治提出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心理疗法、电击疗法等。三是综合说，主张遗传是物质基础，环境是决定性因素，教育具有主导作用。

社会学的研究个案表明，同性恋个体之间在成因上是不完全相同的，单纯从一种理论出发分析他们的成因是不科学的。比如说素质性的同性恋即绝对同性恋和境遇性同性恋的成因有可能不同。境遇性同性恋更多地受环境的影响，如单性性环境的军队、监狱等，他们中有些人在改变了环境之后，又恢复到异性恋的状态。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也许可以为同性恋研究提供参考，但艺术表现不是去证明或说明，它带来的是社会文化认知和审美体验，而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感受艺术提供了知识基础。

二、当代同性恋的生存境况

同性恋自古以来就是被否定的社会现象，19世纪早期被医学界定为性变态，在法律上大部分西方国家对同性恋都实施程度不等的制裁和禁止措施。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同性恋的生存境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同性恋权利运

动是促成改变的直接原因。20 世纪 60 年代是美国文化的激进时代，同性恋权利运动也孕育其中，并在 70 年代爆发，影响整个西方世界，洛杉矶的同性恋大游行至今依然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

同性恋的法律地位在改变。欧洲从 1989 年以来出现两次同性恋立法浪潮，丹麦、法国、匈牙利、比利时、荷兰、德国、芬兰、西班牙等国相继在法律上给予程度不同的认可，荷兰是第一个将婚姻制度适用于所有伙伴关系而不考虑其性别的国家[3]。在北美，加拿大于 2005 年 7 月立法承认同性婚姻，成为继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之后，第四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美国各州的同性恋立法情况不尽相同，有超过一半的州承认同性恋伙伴关系或同性婚姻的合法性；视同性恋为非法的州对同性恋的量刑从 30 天到无期徒刑不等。总体上，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同性恋法律体现了以下原则：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不在公共场所进行，双方自愿，法律便不再追究同性性行为。在中国，内地目前对同性恋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予以禁止，非刑事化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得到认可，但是对同性恋的行政处分和党籍处分是很特别的处罚方式。港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很苛刻的。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中期，香港警方对同性恋的搜查逮捕相当厉害，搞得风声鹤唳，最终引起社会舆论纷纷。经过反复争论，1991 年 7 月香港颁布了同性恋非刑事化草案。

公众态度和社会舆论在走向和缓。有关调查数据显示：1977 年美国只有 43% 的人接受同性恋，47% 的人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4]。而到 90 年代后期，53% 的美国人认识同性恋者，其中支持同性恋的占 73%；不认识同性恋者的有 55% 的支持率，两者合计，大约有 64% 的人支持同性恋。在所有被调查者中，70% 的人认为，社会应给予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平等的工作机会[5]。1994 年出品的美国影片《费城故事》（汤姆·汉克斯主演）就反映了同性恋者的平等工作权问题。当代西方媒体对同性恋问题涉及较多，同性恋已经不是个时髦话题，对同性恋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社会保守势力和宗教势力。西方人的宗教观念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和态度。宗教势力一直没有停止对同性恋的反对、制止行动。80 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危机引发了社会“恐同症”的升温，这种情况持续到 90 年代上半期。另外，军方对同性恋一向持保守态度，以英美为最，但近年来也开始松动。2005 年英国皇家海军在征兵中表示，会增加适合同性恋群体的军规。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还要保守一些。在内地 1989~1990 年刘达临教授主持的全国两万例调查中，3360 名大学生中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的为 86.4%（包括认为是“变态行为”、“不道德行为”、“罪恶行为”的），认为是少数人正常行为的有 9.6%[6]。另一项调查显示，1997 年上海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是：无人表示赞成，表示理解的为 23.4%，不赞成的 52.5%，视情况而定的 14.2%，应惩罚并强迫改正的 10%[7]。两相比较，六七年间大学生对同性恋的否定比例下降了 20 多个百分点。到 2003 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选修课程，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这反映了社会对同性恋认知的一种趋势：人们开始理性地认识同性恋问题。但是，大学生是一个知识层次高、思想活跃开放的群体，一般民众的态度还达不到这种程度，把同性恋视为病态、怪胎、罪恶的观点还大量存在。在香港，情形相对宽松。90 年代之后，香港媒体和艺术领域对同性恋的反映普遍增加，一些同性恋者也公开亮相（如张国荣、关锦鹏）。2002 年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连同同志社区联席会议作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不同性倾向人士的接受程度，较 1996 年大幅攀升，误解相对减少。平均九成受访者认为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应享有平等权利，建议政府立法保障不同性取向人士[8]。台湾民众对同性恋的认识和内地的情况差不多，官方对同性恋的态度也逐步放开。2004 年底台湾“教育部”在“性别平等教育法实施细则”草案中，把“同性恋教育”纳入性别平等教育课程，这意味着同性恋不再成为校园禁忌。

第二节 同性

恋：一段暧昧历史

同性恋的称谓和科学研究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可以回溯到原始初民时代。在历史发展中，遮蔽在异性恋主流下的同性恋始终是一个难言之隐，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还彰显为一种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

一、同性恋在西方

在西方，古希腊、文艺复兴和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是同性恋生存空间比较

宽松的时期，而中世纪则是同性恋惨痛的炼狱时代。

古希腊时代是同性恋文化极为兴盛的时期。男同性恋在贵族阶层是一种流行时尚，并成为古希腊社会的特征。这在历史文献、文艺作品中有大量记载和表现。《荷马史诗》描述的特洛伊战争中，英雄阿基利斯正是由于对帕特罗克勒斯的同性之爱，才重新披挂上阵，击败特洛伊英雄赫克特耳[9]。古希腊军队中的同性恋很突出，他们认为同性恋情能够激发勇气。公元前 378 年，底比斯组建了一支同性恋军团，由于战斗力强，成为底比斯军队的核心[10]。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都留下了其同性恋故事[11]。女同性恋在古希腊也存在。被称为“第十缪斯”的女诗人萨福（Sappho，生活在公元前 7 世纪）是历史上著名的女同性恋者，她写了大量表达同性之爱的诗歌，献给她的女弟子。女同性恋的名称（lesbian）就来自萨福居住和授业的莱斯波斯岛（lesbos）。古希腊人把同性爱和异性爱视为同等自然的事情，但是男性间的同性爱比其他形式的爱要高尚得多。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伦理学》中主张：“最完美的友谊和爱情大多产生于男人之间。”[12]同性之爱被古希腊人哲学化、伦理化、美学化，对后世的同性恋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古罗马也存在大量同性恋现象，但和古希腊有很大不同。“罗马鸡奸十分普遍，但仍停留在纯肉体的阶段。罗马男人对从精神和意识上赢得‘英俊少年’丝毫不感兴趣，而只想诱奸他们或者把他们买到自己的床上”[13]。罗马共和国时期，政治家们如有同性恋行为，无异于引火上身。

中世纪同性恋受到了严酷的禁止和打击。公元 4 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罗马成文法明确界定同性恋行为是违法的。基督教是坚决反对同性恋的，在《旧约·创世纪》中上帝毁灭了淫乱无度（包括同性恋行为）的索多玛城，《圣经》从一开始就判定同性恋有罪。同性恋者在中世纪受到的最严酷量刑是活埋和火刑。1975 年意大利同性恋导演帕索里尼拍摄了影片《索多玛的 120 天》，影片的基本构思就来源于《圣经》。鸡奸“sodomy”一词，就由索多玛而来。帕索里尼在他另一部影片《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展示了火烧同性恋者的残酷情形。

文艺复兴时期，同性恋逃离了中世纪的“酷刑”，在文学艺术中再次得到赞美。近代以来，同性恋基本处于悖德、违法的语境下，但是，这一时期开始了人类认识同性恋的理性化进程：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刑事化到非刑事

化，病理化到非病理化的过程。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制定了判处鸡奸罪死刑的法律，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法律对同性恋的制裁。总体来看，英美法律对同性恋比较严厉，法国及其他受到《拿破仑法典》影响的国家相对宽松。对同性恋非刑事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沃芬顿报告”[14]，它最终导致了英国法律在1967年承认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合法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对同性恋的法律制裁均明显放宽。在医学领域，1886年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完成《性心理疾病》一书，他在书中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病，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同。此后一直有学者质疑或否认这种界定，包括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H. Ellis）、弗洛伊德、美国的金西（A.C. Kinsey）[15]等。对非病理化进程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他深刻研究了西方性发展史，认为人类性话语的主旨就是“要把经不起繁殖经济检验的性形式从现实中驱逐出去”[16]，同性恋便首当其冲地遭到驱逐。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率先把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1992年联合国在确认同性恋是少数人的自然现象后也将同性恋从心理障碍疾病分类中剔除。

二、同性恋在中国

中国古代对同性恋的称谓非常丰富，如龙阳、断袖、分桃、嬖人、男宠、男风、南风、顽童、变童、契兄/契弟、相公、小官等。其中有些称谓还有其他的含义，缺乏对同性恋的确指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性恋的暧昧性。正史、野史、文学作品都对同性恋有所反映。不同时期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不同，但纵观中国古代同性恋，下面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古代男风大体是在世人疑惑的目光下，以一种暧昧的状态存在于社会当中”[17]，有彰显有隐晦，社会对同性恋持比较稳定的倾向于中立的反对态度。

先秦时期的同性恋较为兴盛，夏商周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商书·伊训》有“三风十愆”之说，其中三风之一为“乱风”，“乱风”有“四愆”，其一就是“比顽童”，即搞同性恋，可导致“家丧”“国亡”，祸害极大，可见当时同性恋并不少见。这一时期同性恋主要反映在国君及其嬖幸之间，也存在于公卿士大夫之中。卫灵公和弥子瑕、卫灵公和宋朝、魏王和龙阳君、楚宣王和安陵君等同性恋故事，留下了一些著名历史典故和同性恋词汇，如余桃、龙阳、泣鱼、“美男破老”[18]、“艾豕娄猪”[19]、“鄂君绣被”[20]等。这

时人们的性取向比较自由，美女美男并列，性别出入自然。诸子百家对当时同性恋风气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后来儒家指责其为“春秋淫乱”，不合礼数，主要限于道德谴责，对同性恋问题未予重视，不多加评论。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这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对同性恋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史记》、《汉书》中的“佞幸传”[21]记载了秦汉时期的同性恋现象。比较著名的同性恋事件有：汉文帝和邓通、汉哀帝和董贤。这些佞幸常参与政治事务中，加剧了权力之争和社会矛盾。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同性恋的活动较为活跃。《宋书·五行志》中这样描述：“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效仿。”[22]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事频繁，让人感觉人生如朝露。魏晋哲学承继老庄传统，主张任情任性，整个社会风气倾向放浪，同性恋被视为“性情中事”就很自然了。宋代的男娼比较兴盛，以至于官方出面管制，“致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2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南风风气。

中国古代史著述对明清时期同性恋现象的记载最为详尽。明代工商业发达，王阳明哲学崇尚个性发展，释放本性情欲，所以世风日趋淫柔浮华，到明代中后期南风日劲。明武宗宠幸的男色之多，在历代君王中可谓无人可比。明熹宗则“不近妃嫔，专与众小内侍玩耍，日幸数人”[24]。严嵩之子严世蕃、戏曲家张凤翼、文学家张岱等，都是当时好男风的名士名人。清代男风在社会各阶层也比较流行。袁枚、郑燮、陈维崧[25]、毕沅，以“余桃之好”闻名于世。毕沅因得了名优李桂官的资助，高中状元，李桂官由此得名“状元夫人”。其他社会阶层，如兵士、狱吏、学塾师生、优伶、剃头匠、和尚、农民起义军，各色人等的同性恋情况，在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这一点和前世很不同。明清同性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狎优，即针对优伶的男色活动，这与中国戏曲发展及明清禁止官吏宿娼制度都紧密相关。优伶同性恋者在清代被称为相公，虽然不能简单地把相公等同于男妓，但其中有大批是出卖色相的，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私寓制度。北京的八大胡同原本是相公堂子集中的地方。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后，“像姑业”[26]才逐渐衰落。

民国元年4月21日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发布了一个禁止私寓的告示，这个告示是在著名戏剧艺术家、梆子戏演员田际云的奔走呼吁下得以出笼的。告示

中提到了“整齐风俗”、“保障人权”的字样，表明优伶人格、荣誉意识的提高。这个告示的发布标志着私寓制度的结束，也可以把它视为“整个中国古代同性恋史的结束标志”[27]。

通过考察东西方同性恋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到两者在同性恋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对待同性恋的基本态度而言，西方从古至今经历了古希腊时代的宽松——中世纪的严酷——近现代以来的宽容。中国古代则一直保持了暧昧的宽容态度，从近代以来才变得严厉起来。道德评价和法律制约是对同性恋表态的两个重要体系。西方是从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出发对同性恋做出道德评判，中国从儒家文化价值观衡量同性恋的道德水平，很难说两者的评价孰轻孰重，但道德的力量给东西方的同性恋者都带来沉重的枷锁。在法律制约上，东西方存在明显差别。西方从古至今对同性恋的立法比中国要明确，但其执行情况因时代不同也不尽相同。

第三节 同

性恋：一种艺术表达

一、中国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

中国同性恋的悠久历史和阶段性兴盛决定了它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有一席之地。同性恋文学艺术就像它的历史一样，有起伏盛衰，产生了大量文本，涉及各种文学样式和体裁，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值得深入研究。

1、古代

在古代，同性恋一直是文学艺术倾心的表现对象之一，许多作品脍炙人口，可谓缠绵悱恻自有情、嬉笑怒骂皆成趣，构成了古典美的一极。

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性恋诗歌华美繁复，对男性美和同性恋表达了放纵无忌的赞美和追求。最具代表性的是阮籍（公元210~263）的《咏怀诗》第十一首，它歌咏了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人物安陵君和龙阳君，质朴深沉，委婉动人：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盘折似秋霜。
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衾裳。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后，在唐诗、宋词、元曲、元杂剧、明清小说中，均有同性恋内容。特别是明清文学对同性恋的表现最为丰富，许多文学大家对同性恋题材颇为关注，形成了古代同性恋文学的高峰。

戏剧对同性恋的反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古代或当时著名的同性恋事件/人物为题材，加以正面描写，如明代邓志谟的《龙阳君泣鱼固宠》。二是在其他剧作题材的表现中兼有同性恋内容，作为补充或戏剧噱头，如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的《酒家佣》、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长生殿》等，都有或多或少的同性恋情节或对白。元明清三代的戏剧以明代的同性恋戏剧为盛。戏剧中常对同性恋进行插科打诨式的调侃，有时表达得相当放纵，如《长生殿》中的对白：“你后庭像银矿，掘过几多人！”[28]

诗词散曲对同性恋的表现也是相当丰富的。明代的冯梦龙、凌蒙初、张楚叔/张旭初兄弟都在所编的散曲集中收录了男风作品。冯梦龙是对同性恋题材最感兴趣的古代文化名人之一，他做了几套同性恋散曲，收录在《太霞新奏》中，把这种感情描写得真挚感人，如《情仙曲》描写了一对生时相爱、死后相依的同性恋者：“想是前生夫妇，做了今生弟兄。似此今生恩爱，未审来生可能。不愁命短，只愿双魂并。春难久，花易零，但能同死胜同生。分明是花重放，春再生，黄泉相见笑相迎。”清代的袁枚、郑板桥、陈其年本身就有“余桃之好”，在其诗词中也较多地表现了同性恋情。袁枚生性放荡不羁，他把自己和徒弟的关系描写得如同夫妇：“夜半聊吟同剪烛，人间应少此师生。”[29]

明清小说对同性恋的表现可谓洋洋洒洒、千姿百态、快意浓情、褒贬兼具。不管是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都有大量同性恋内容。其世情、艳情小说在描写中常常是男色、女色兼有，男风之事似乎成为另类补充，其实也是世情百态的真实写照。专门描写同性恋的小说有：明代冯梦龙的《情史·情外

类》、王弼洲的《艳异篇》、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香春质》、《弁而钗》，清代陈森的《品花宝鉴》等，其中《品花宝鉴》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同性恋世象小说。其他大量作品虽不是以同性恋为中心或主题，但涉及到同性恋情节；或者是在小说集里包含一些同性恋故事。如《红楼梦》、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清代李渔的《无声戏》（即《连城璧》）、色情小说《肉蒲团》、《金瓶梅》、清代纪实性小说《闽都别记》[30]，等等。

中国古典文学对同性恋的表现从先秦到明清绵延不断，形成三种基本倾向：一是鲜明地进行正面讴歌，赞美人/情之美；二是基本否定，进行反面的讥讽、嘲弄和批评；三是较为客观地记录社会现实，反映男风世象，臧否由人评说。中国古典文学总体上对同性恋持和缓的批评态度，即使像推崇男性纯情深交的《品花宝鉴》，也不得不把梅子玉与杜琴言的“断袖之情”处理为公子哥的私情，为岳丈家知晓实为尴尬之事。在明清很多文艺作品中，作者一方面以警戒批评的态度指责同性恋的种种恶行弊端，同时又饱含激情地描画同性之情的缠绵感人，流露出对自然生理欲望的张扬，试图在同性恋现象中挖掘真善美的因素。

2、现当代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同性恋内容的表现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五四文学”标榜人道主义、张扬自我和个性的大旗下，同性恋书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女同性恋描写，可谓“五四”女性文学中的一道特殊景观。中国现代历史赋予文学艺术严肃的时代命题，担负着沉重的家国梦想，同性恋题材委实太边缘化，现代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涉及总体上是非常有限的。1949年之后，直到80年代，与时代氛围和同性恋的社会处境相联系，同性恋问题成为文学艺术难言的禁忌。90年代之后，同性恋文学逐渐出现和增多。

“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空气自由，作家们可以畅快地表达心中之思、胸间之情。作家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和《海滨故人》，石评梅的《玉薇》，丁玲的《暑假中》，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都写到了同性恋。小说中的“前卫”描写，今天看来都让人惊讶。在1929年出版的自传体文学《我的幼年》中，郭沫若以细腻温馨的笔触回忆了自己少年时期的同性恋经历。对于同学间的情谊，他这样表白：“我们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种同性恋爱的心理一样，但我们的相爱确是比恋爱更严

肃。”而和另一位姓汪的少年的要好使他“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在一个醉酒的夜晚，汪君买了甘蔗为他解渴，少年的郭沫若沉浸在无限的幸福里：“啊，我真爱你呀！我紧紧地把他抱着。他那晚就和我睡了一夜……”对同性恋的描写是如此坦荡直率，恋情又是那么美好，可谓一段两情相悦的美少年之恋！

1949年之后到70年代末，中国内地同性恋文学基本处于沉寂状态。丁玲出版她的小说集时，都没有把《暑假中》列入其中。也许会有一些隐秘变相的表现，但总体看，在异性恋文学都变得敏感微妙的时代，同性恋文学更是没有话语的余地了。

80年代，内地同性恋文学逐渐出现。最初只是在作品中涉及到同性恋，或者很隐秘地表现同性恋，之后便大胆地以同性恋为题材，正面刻画同性恋的世界。作家们更多地以同情严肃的笔调表达对同性恋者的一种人文关怀，其中，女性作家成为冲锋陷阵的先锋，如陈染、林白、铁凝、张欣等。总体来看，内地同性恋文学的创作较之港台还显得平淡，有力度、有影响的作品付之阙如。

在港台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同性恋文学创作最富有成效的是台湾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白先勇就有同性恋小说《月梦》、《青春》、《漫天里的星星》、《孽子》，郭良蕙的小说《第三性》也涉及同性恋。80年代出现了曹丽娟的《童女之舞》、朱天心的《春风蝴蝶之事》、凌烟的《失声画眉》等。90年代之后同性恋创作呈大幅上升之势，其中杜修兰的《逆女》获得皇冠大众小说奖，邱妙津的《鳄鱼手记》获得时报文学推荐奖，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1994年时报百万元文学大奖，一时间同性恋文学大有跻身主流文学之势。纵观台湾同性恋文学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代：解严之前、解严初期、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不同的时代文化特征、作家不同的创作心态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策略、美学特征和思想观念。解严之前的白先勇小说以多重主题变奏，传达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解严初期的朱天文、邱妙津小说则以一种独白式叙事体挖掘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自身的认同迷茫和对同性爱的困惑；20世纪末新世纪初新锐小说家们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熏陶，以“酷儿”的姿态，一扫同性恋文学旧气象。洪凌的《肢解异兽》、《异端吸血鬼列传》、《宇宙奥狄赛》，陈雪的《恶女书》，纪大伟的《感官世界》等，

都采取了反叛激进的叙事策略。他们大胆狂野地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体制进行颠覆，张扬人性的自由和生命的潜能，试图构筑一个美好的同性恋精神家园。

二、西方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

与中国相比，西方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要直接和丰富得多。古希腊时代同性恋的繁盛使得其文学艺术同样昭彰，比中国先秦时代的同性恋文学更容易考证。西方中世纪在宗教阴霾下陷于沉寂，逊于中国同性恋文学的发展。文艺复兴带来同性恋文学艺术的近代复苏，直到现代，汇成洋洋大观，使人不可小觑。

1、文学、戏剧、绘画、雕塑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同性恋在神话、诗歌中留下诸多笔迹。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是个双性恋者，她的同性恋诗歌是西方最早的同性恋抒情诗。美国学者穆尔顿·亨特这样评价：“她的诗歌对后世的文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千五百年来，情人们所忍受的情感痛苦，大部分已被萨福描写过。她的这一发明在产生心理影响的同时，也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作用。”

[31]古罗马早期的诗人卡图鲁斯（Catullus）留下了100多首抒情诗，大部分是抒发对同性和异性情人的爱情。古罗马中期的著名诗人贺拉斯（Horatius）也留有大量同性恋诗歌，见于其《歌集》前三卷。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和中国先秦时代的同性恋文学有一点是相同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对人本身的欲望书写都显得自然和朴素。这种自然朴素超越了性别界限，或者说性别、人性意识还没有被文化的金缕玉衣包裹得繁复、复杂。所以，文学艺术对同性爱的歌咏也是那么直接和奔放。当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下，东西方的同性恋文学艺术在美学特征上还存在种种差异。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学艺术呈现一派活泼泼的景象，同性恋在文学艺术中的模样再次丰富生动起来，在小说、戏剧、诗歌、绘画、雕塑领域都出现了对同性性关系的描画，而且同性恋作品的作者很多是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者。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商籁诗》（即《十四行诗》）是杰出的同性恋诗作。同性恋艺术家，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32]等，其作品与他们的性取向都存在某种关联。

文艺复兴之后，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同性恋作家有英国的拜伦（1788~1824）、美国的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美国的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惠特曼被誉为现代诗歌之父。他一生漂泊潦倒,未婚娶,但其内心的同性爱欲像地下涌动的岩浆,借助他的睿智和文采,迸发成绚烂的诗歌。他的《草叶集》中有一组同性恋诗歌,名为《芦笛集》。诗集初版时,人们对之无情谩骂。第三版时,好友劝其把描写性爱的部分删掉,但惠特曼说,他的欲念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他要走自己的路!惠特曼的同性恋诗歌热情奔放地讴歌同性爱,具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同性恋者的崇敬,被称为现代同性恋文学之父。他和他的诗歌给痛苦迷茫中的同性恋者带去了福音和阳光,像王尔德、纪德、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诗人/历史学家约·阿·西蒙斯(1840~1913)、文学大师D·H·劳伦斯等都受到了惠特曼的影响,也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现当代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同性恋成为20世纪文艺创作的一个深层动机、一种深度模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同性恋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同性恋人群或同性性行为增加(特别是境遇性同性恋);另一方面,战争的创伤让人们重新思考世界和人生,这些都促进了同性恋文艺的发展。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新语境,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同性恋文艺生长的土壤。

英国著名同性恋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其性取向而被捕入狱,其作品隐含了同性恋情欲。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1882~1941)和两位好友女作家保持过同性恋情,其著名小说《奥兰多》是写给同性情人的,是“当代文学中最长最迷人的情书”。作家E·M·福斯特(1879~1970)是同性恋者,终生未娶。他把自己和同性情人的经历写进了小说,其中《莫里斯》[33]被誉为同性恋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在《虹》、《恋爱中的女人》、《狐》等小说中都描写了同性恋,包括女同性恋。他对女性爱恨交加,崇尚男性间的爱情。

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的代表作是歌颂同性恋的散文《人间的粮食》,影响了几代青年人。他还出版了同性恋小说《科立东》、《背德者》、《伪币制造者》,194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女院士、著名女作家玛·尤瑟纳在其小说《致命的一击》、《一枚传经九人的银币》、《熔炼》等中,描写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层次的男同性恋。评论家若西亚纳·萨维涅说:

“如果说男子同性恋使玛格丽特·尤瑟纳如此着迷，以致成为她作品里的一个几乎总是出现的主题，这并非是为了隐瞒她对女人们的爱情，而是表明她梦想成为一个男人。”[34]法国著名剧作家让·热内（1910~1986）在自传《偷儿日记》中刻画了自己强烈的男色心理和反社会情绪。而法兰西学院院士、大作家亨利·蒙特朗（1896~1972）晚年发表小说《少男们》，坦白了自己的同性恋秘密，并觉得此后无话可说，最终自杀。

美国当代同性恋文学艺术作品颇为丰富。著名作家和画家亨利·米勒（1891~1980）的小说《北回归线》、《南回归线》，因大胆描写了同性、异性性行为而屡遭查禁。黑人小说家詹姆斯·鲍德温（1924~1987）的小说《乔瓦尼的房间》是同性恋文学的名篇。海明威（1899~1961）在其小说中多处描述了同性恋者的形象，如《太阳照样升起》、《过河如林》、《溪流中的岛屿》、《伊甸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激进、最具实验性的作家之一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 Stein, 1874~1946）长期和自己的女秘书一起生活，其自传《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就描写了两个人的同性恋情。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美国文化的激进时代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同性恋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从1964年到1965年，约有348本同性恋题材的书出版，超过了西方文学史上此前有关该题材书籍的总数[35]。70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紫色羽毛管”的同性恋作家，其中，爱德蒙·怀特（1940年生）是最受拥戴的当代同性恋作家，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小说，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一个男孩自己的故事》（1982年）和《美好的房间是空的》（1988年）记述了同性恋意识的社会史。

除了小说，诗歌、戏剧也是同性恋书写的主要形式。英国著名的同性恋诗人有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奥登（Hugh Auden, 1907~1973）、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 1887~1915）等。美国同性恋诗歌的代表人物是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其名诗《嚎叫》可谓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号角。著名的同性恋剧作家有英国的乔·奥顿（Joe Orton），他和同性情人肯尼斯

（Kenneth Halliwell）双双殉情。奥顿的不少剧作成为英国剧坛和影坛的精品：《消遣斯隆先生》、《赃物》、《领班见闻》。美国的田纳西·威廉斯是著名的同性恋剧作家，代表作如《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1955）。美国剧作家爱德华·艾伯塔（Edward Albee）在其剧作《谁怕维

吉尼亚·沃尔夫》、《不稳的平衡》、《海景》中都探讨了两代人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对立，被同性恋者视为同道。1968年，马特·克劳利（Mart Crowley）的《乐队小伙子》（The Boys in the Band）在百老汇连续上演1000场，成为美国同性恋戏剧发展的里程碑。1982年，哈维·菲尔斯坦（Harvey Fierstein）的《畸形恋情三部曲》（Torch Song Trilogy）进入百老汇商业舞台，获得了托尼奖和普利策奖，1988年改编为同名电影。

2、电影

美国学者维托·拉索（Vito Russo）在他的《胶片密柜》一书中谈到同性恋的亚文本（subtext）和隐秘文本（hidden text）：前者影片本身不一定是同性恋题材，但是影片中男性身体的展示和较量、仪式化的争斗、男性间暧昧的对视等都会引起同性恋观者的特别观照；后者则把同性恋的主题或者意味置于不易察觉的、隐秘的深层。拉索认为，在经典好莱坞电影中，同性恋保持着相当的沉默和密语状态。同性恋的隐秘文本要比亚文本多得多，这些隐秘文本只能被那些敏锐感知同性恋编码信息的观众发现[36]。本文沿用亚文本和隐秘文本的概念，并把明确出现同性恋话语，但只是很次要的剧情因素或戏剧噱头的电影归入“亚文本”。由此，本文把同性恋电影界定为：明确地以同性恋为主题或者把同性恋作为重要剧情因素的影片，即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但是本文在论述中，鉴于早期电影很少涉及同性恋题材，即使包含同性恋内容，常常只是亚文本或者隐秘文本，所以用“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涵盖所有涉及同性恋内容的电影文本，那么它就包括了亚文本、隐秘文本和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

电影诞生后不久就涉足同性恋，但是比起小说、戏剧、绘画来，时间要晚，限制更多。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阿瑟·莱尼格在分析美国电影审查史时，列出电影受到更多限制的原因：电影影响的人数不可计数；它迎合那些尤其需要严格指导的下层阶级；它是一门尚待考虑或能成为“艺术”的媒介；它本身描绘生活太形象化和直接了[37]。那么同性恋主题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媒介进行传播，其“恶果”会大大超过小说戏剧。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观众的接受心理、审美习惯和观影回馈又影响着电影制作。所以，电影是公众趣味的指示牌，也是最容易屈服于公众偏见的艺术形式（相对于小说戏剧绘画）。那么，在公众和官方都很难接受的情况下，同性恋进入电影银幕就变得困难和复

杂多了。

考察西方电影对同性恋的表现，以欧洲和美国电影为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70 年代到 80 年代、90 年代以来。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同性恋社会语境是比较严酷的，主流电影很少涉足同性恋，或者非常谨慎，美国电影表现得比欧洲电影更加排斥和退缩。

欧洲艺术的自由传统使得电影对同性恋题材的反映，比美国电影来得开放和豁达。特别是 20 世纪前期，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俄国的形式主义潮流焕发了奇异的艺术个性，把同性恋这一主题也融入了作品中。

1916 年 M·斯蒂勒 (Mauritz Stiller) [38] 在瑞典拍摄了同性恋影片《翅膀》(Wings)，这大概是电影史上最早的同性恋电影[39]。这部影片的导演、编剧都是同性恋者。同性恋在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不合法和有违道德的。上映后，瑞典主流报纸指出了其主题敏感性，但影片还是获得了成功。也许影片对同性恋主题既鲜明又隐蔽的描写策略，反而产生了一种迷幻魅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 (1919~1933)。战争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一种活跃而动荡不安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柏林是“世界的性都”，人们在性的问题上信奉一种狂热的快乐主义，同性爱快乐是其主要内容。当时有多部影片表现了同性恋。1919 年的《与众不同》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导演理查德·奥斯瓦德

(Richard Oswald)，主演康拉德 (Conrad Veidt)，在柏林上映后，引起轰动。一年后，此片被全面禁映，成了只有科学研究者才可以看的“科教片”。1931 年的《穿制服的女孩》(导演 Leontine Sagan) 是早期女同性恋电影之一，上映后好评如潮，只是在纳粹时期遭禁。后世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常常强调其反法西斯内容、风格化的艺术品格，而缄口其女同性恋主义。

法国在同性恋文学艺术上是最为开放的。如前所述，法国文学有着长期而独特的同性恋艺术传统，同性恋艺术家总是引领着文学形式上的前沿探索，而重要的是这些同性恋艺术家大多是文学大家，大大影响了法国电影的艺术传统。分析上个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法国同性恋电影，有两个人物值得重视：让·考克多 (Jean Cocteau) 和让·热内 (Jean Genet)，二人皆是同性恋者。考克多的电影作品有《诗人之血》(1930)、《奥菲》(1950)、《奥菲

遗言》（1963），这些电影的主人公常是孤独的自恋者或同性恋者。考克多善于以象征手法表达同性恋意象，最鲜明的就是以镜子营造了一种超现实的绝世幻象。热内 1950 年拍摄了同性恋电影《情歌短曲》（Un Chant d'Amour）。影片时长只有 20 分钟多一点，是无声黑白片，表现了监狱中的同性恋，至今仍被很多地方禁演。英国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

（Richard Dyer）这样评价：“以商业术语来说，它太艺术不能谓之色情片；它太色情又不能谓之艺术片。”[40]在讨论同性恋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上，热内是一个参照点，他创造了同性恋存在的一系列象征。“热内”成为一种风格、一种象征。后世很多电影导演通过各种方式向热内致敬，从美国导演比利·怀特（Billy Wilder）到德国导演法斯宾德，再到美国导演托德·海因斯（Todd Haynes）……

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海斯法典体现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和宗教教义的维护。30 年代中期审查力量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直到 50 年代这道“紧箍咒”才开始松动。在这种情形下，好莱坞电影在遭遇同性恋问题时，不得不回避：或是删除同性恋内容，或者改写人物身份，或者含混地偷渡同性恋内容。著名同性恋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很多作品都含有同性恋意味，改编成电影后，同性恋情节被模糊了：《欲望号街车》（1951）模糊了主人公布兰奇前夫的同性恋身份，《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8，导演 Richard Brooks）也对主人公布里克和同学斯基普的同性恋关系不置可否。这种做法使影片变得不可捉摸，正如美国学者拉索（Russo）所说，这种隐秘文本需要敏锐的感知。这种改写和模糊策略不仅受制于审查制度，也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理念的体现。好莱坞的经典英雄形象不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这种理念持续至今。1962 年《阿拉伯的劳伦斯》把劳伦斯的同性恋身份改写了，塑造了一个人所共仰的异性恋英雄。

20 世纪 60 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革命的 10 年，激进和民主是其文化标志。60 年代中期美国电影审查的力量日趋衰落，电影人终于可以像小说家那样自由表达了。在电影界，好莱坞从欧洲影片中学习新鲜的题材和艺术手段，裸体主义开始出现，并开始涉足同性恋，如巴兹尔·迪尔顿的《受害者》（1961）、托尼·理查德森的《蜜味儿》（1961）、约瑟夫·洛赛的《男仆》（1963）、约翰·施莱辛格的《午夜牛郎》（1969）等。

和好莱坞不同，美国的地下电影成为同性恋题材的“专有领域”。从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到 60 年代晚期，美国地下电影是那些低成本的、片时短的、主流电影工业之外的电影。由于它们拒绝某些好莱坞电影理念，打破了禁忌，所以处于社会、经济、法律的边缘，常常引起争议。地下电影是一种个人化写作，把惯例和官方意见抛掷脑后，在当时性禁忌的背景下，个人化写作意味着对性的开放。选取同性恋题材（一些著名的地下电影导演本身就是同性恋者）本质上体现了电影书写的个人化。地下同性恋电影的著名导演有：肯尼斯·安格（Kenneth Anger）、格雷戈里（Gregory Markopoulos）、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安迪·瓦侯（Andy Warhol, 1928~1987）、保尔·莫里西等。《天蝎座升起》（Scorpio Rising, 1963）是肯尼斯·安格最有名的影片。肯尼斯在影片中使用了很多 20 世纪美国同性恋情色形象，如水手、自行车男孩、肌肉发达的男人；并把同性性快感、行为、器官符号化，生动而热烈。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 60 年代末期同性恋的社会文化处境已经发生了松动，1969 年 6 月发生在纽约的石墙酒吧骚乱预示了 70 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到来。在这个时期，同性恋文学艺术既反映了这场运动，也成为运动的组成部分。理查德·戴尔说：“没有这场运动，同性恋电影还仅作为家庭录影躲在衣柜里。”[41]同性恋电影的文本数量较前一个时期显著增加，而且在内容上更多地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把性与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国家捆绑分析，权力和欲望成为核心主题，散发着昂扬的“斗争”气息。与美国电影呼应，欧洲同性恋电影也充满了政治气息，如德国法斯宾德的影片、意大利帕索里尼的《索多玛的 120 天》（1975）。最能标明同性恋政治行动主义

（activism）的影片是纪录片，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出现了 40 部左右的同性恋纪录片，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典、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影片真实记录了当代同性恋的各个方面。美国纪录片《哈维·米尔克时代》（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1984）记录了美国平权斗士、旧金山市政委员、同性恋者米尔克的故事，获得了第 57 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和 80 年代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同性恋影片拓展了风格样式，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丰富多姿，积极的同性恋形象出现并增多。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如果说 90 年代以前西方同性恋文化的鲜明特征是以边

缘异类的形象与社会现实/约束作抗争；那么进入 90 年代，西方同性恋呈现出一种喧嚣、亢奋的文化凸显性，大有突进主流文化的架势。

同性恋电影的制作、传播和影响都大幅度增加和提高。首先，同性恋电影的传播渠道大为扩展。电视、DVD 和计算机网络成为经济和便捷的传播途径。其次，同性恋群体的文化空间已经形成，表现为各种同性恋组织、艺术团体、定期举办的活动等，这为同性恋电影的制作、发行提供了一定保障和渠道。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同性恋电影节的兴盛。1976 年世界第一个同性恋电影节开始于美国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s Frameline），现在同性恋电影节已遍布欧洲、北美、大洋洲、亚洲、中美洲、南美洲和南非。位于洛杉矶的电影节注册中介 Withoutabox 估测，北美大约有 30 个同性恋电影节。再次，同性恋电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众市场。同性恋影片稳定的受众是占人口比例 6%~7% 的同性恋者。从商业角度看，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群体，同性恋电视节目的增多也是考虑到它的商业价值。最后，主流评价体系对同性恋影片逐步认可。同性恋电影参评世界各大电影节或电影评奖活动并多次获奖。最近的例证就是获得美国金球奖四项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同性恋影片《断臂山》

（2005，美国，导演李安）。新酷儿电影（new queer cinema）的出现是 90 年代以来同性恋电影最重要的现象。1992 年美国电影研究学者 B·R·瑞迟（B. Ruby Rich）撰文宣告了新酷儿电影的到来[42]。它们来了，装扮时髦、眼光挑衅：《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 Jennie Livingstone, 1990）、《毒药》（Poison, Todd Haynes, 1991）、《年轻灵魂的反叛》（Young Soul Rebels, Issac Julien, 1991）、《爱德华二世》（Edward II, Derek Jarman, 1991）、《我自己的爱达荷》（My Own Private Idaho, Gus Van Sant, 1991）……瑞迟认为这些作品体现了一种共同的风格和对事物的感受力：挪用、模仿、反讽、以社会建构主义观念重塑历史。它们打破了以往影片中的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态度不恭，但充满活力，洋溢着快乐。新酷儿电影是在酷儿文化背景下崛起的。酷儿文化（queer culture）可以说是同性恋文化（gay culture）的深入演进，在 90 年代巍然成风。“酷儿”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43]。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变性者、双性恋以

及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nonstraight）立场者。在展示人的各种欲望，尤其是那些被遮掩压抑边缘化的非常态欲望方面，“新酷儿电影”以后现代主义风格，带给人们一种嚣张、罪恶感，但又是充满活力的快感。

第一章对同性恋的社会学、史学、文艺传统的考察，意在为华语电影中的同性恋言说建构社会学认知基础、文史评价体系和美学分析参照。从古至今，同性恋话语的边缘性或非主流性，使人们对之了解不多，在读解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时存在一定障碍（这种障碍同时存在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观众中）。这些历史和艺术传统的考察无疑会给我们的观影和研究提供更深广的体验和认识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同性恋历史发展状况和艺术传统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对华语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产生了影响。在内容上，同性恋的历史境遇在影片中得到了再现。影片《唐朝豪放女》（香港，导演方令正）、《爱奴》（香港，导演楚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性风俗和同性恋相关情况；《霸王别姬》则对清末民初优伶、宫廷的同性恋状况有所反映；《东宫西宫》里可以看到当代同性恋的处境和同性恋者的某些成因。同性恋的艺术传统，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在内容上为华语同性恋提供了很多具体题材，包括一些母题。其中，戏曲是一个很独特的中国文学艺术母题。《东宫西宫》、《游园惊梦》（香港，导演杨凡）、《夜奔》（台湾，导演徐立功、尹祺）、《霸王别姬》都把戏曲作为重要的剧情元素或者某种符号化的意象。另外，同性恋文学是最便捷的电影剧本来源。20 世纪最早的同性恋小说之一、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1912），被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改编成同名电影（1971）。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E.M. Forster）1913 年写下颇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莫里斯》

（Maurice），1987 年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将它搬上银幕，成为同志电影的经典。中国影片《东宫西宫》、《霸王别姬》、《蓝宇》等也是改编自文学作品。历史和当代的同性恋人物、事件成为电影聚焦的对象。如王尔德、萨德、乔·奥顿〔英国导演斯泰芬·费亚斯的《留心那话儿》（Pick up Your Ears）描写了奥顿和其同性情人的爱情〕、帕索里尼（电影《谁杀了帕索里尼？》）、英国导演詹姆斯·威尔（《众神与恶魔》描写了其生平和电影创作）……此外，西方同性恋纪录片记录了大量同性恋人物和事件。中国电影在这方面还非常少，其创作空间应该较大。在艺术风格上，从内

容决定形式的角度分析，同性恋的历史发展情况作为影片表现内容和影片自身书写语境，都会影响到风格的呈现。例如在同性恋处境严峻的时代很难出现喜剧样式的同性恋影片；但在 21 世纪，新锐导演则可以有一定空间阳光灿烂地表现同性恋，如《17 岁的天空》（2004，台湾，导演陈映蓉）。来自文学艺术和西方同性恋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观念对华语同性恋电影将会产生并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中国同性恋古典文学表现出来的那种温婉含蓄、高山流水式的深情之美，在电影《游园惊梦》、《霸王别姬》等影片中得到延续。西方同性恋美学的很多观念在中国电影中也很突出，例如男性肉体美、英俊少年美等。这些方面在后面章节中会作出具体分析。

[1] （美）唐纳德·科里：《同性恋在美国》，1951 年版，
<http://www.vmans.com//10-17/20383782482.html>。

[2] 《玫瑰少年梦》（Ma vie on rose）1997 年，法国，导演艾廉·伯林纳（Alain Berliner）。

[3] （德）M·克斯特尔：《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载《法学译介》，2004 年第 2 期。

[4] 转引自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年版，第 424~425 页。

[5] （美）文森特·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12~113 页。

[6] 刘达临、鲁龙光：《中国同性恋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4~65 页。

[7] 《医科大学新生生殖健康问题的知识、态度、行为研究》，载《中国校医》，1998 年第 12 卷，第 4 期，调查样本 266 人。

[8] 北美华人性别和性倾向研究会主办刊物《桃红满天下》，第 129 期，2002 年 8 月。

[9] 2004 年美国电影《特洛伊》对这一情节作了暧昧的处理，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很难读出里面的同性恋情。杰拉德·皮特饰演阿基利斯。

[10] 黄洋：《从同性恋透视古希腊社会——一项历史学分析》，载《世界历史》，1998 年第 5 期。

[11] 朱云影：《人类性生活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年影印版，第 49 页。

[12] 转引自矛锋：《人类情感的一面镜子——同性恋文学》，台湾笙易有限公司文化事业部，2000 年版，第 127 页。

[13] (美) 穆尔顿·亨特：《情爱自然史》，赵跃、李建先译，作家出版社，1988 年版，第 86 页。

[14] 1954 年英国约翰·沃芬顿伯爵 (John Wolfenden) 受命领导一个委员会检查英国有关同性恋和卖淫的法律。三年后委员会发表了《同性恋罪行和卖淫委员会报告》，简称《沃芬顿报告》。报告认为“除非社会通过法律机构专门将犯罪与恶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否则就应保留一个由个人来判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领域，这个领域用简明的话来说，不关法律的事”。

[15] 金西：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他用 10 年时间，调查 17000 例，1948 年完成《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奠定了性社会学基础。他从统计学的角度为人们认识同性恋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16] (法) 福柯：《性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6 页。

[17]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5 页。

[18] 《战国策·秦策一》：“晋献公欲伐郭，而惮舟之侨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女破舌。’乃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舟之侨谏而不听，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惮宫之奇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宫之奇以谏而不听，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从中可见当时男色流行，与美女并重。

[19] 《战国策》中记载卫灵公嬖幸宋国公子朝，而宋朝又和卫灵公夫人南子相通。卫灵公长子路经宋国时，宋人唱道：“既定尔娄猪，何归吾艾豕。”娄猪指求子或求公的母猪，喻南子；艾豕指漂亮的公猪，喻宋朝。艾豕

就代指与男子保持同性恋关系，又与该男之妻保持异性恋关系的人。

[20] 《说苑·善说》中记载：楚国令尹鄂君子皙长得很好看，一次泛舟水中，划船的越人用越语对其献歌一曲，表达爱慕之情。鄂君明白后，“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即同床共寝。

[21] 佞幸，在这两部书中基本就是同性恋伙伴的代称。从《后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或者没有佞幸传，或者扩大、改变了佞幸的范围和性质，淡化了同性恋含义。

[22] 咸宁、太康是晋武帝年号，时间为公元 275 年至 289 年。

[23] 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其中“致和”应为“政和”，是宋徽宗年号。

[24] 明代纪实小说《梼杌闲评》，转引自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10 页。

[25]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之子，以诗词名世，留有《迦陵词全集》、《湖海楼诗集》、《陈迦陵文集》等。

[26] 像姑或相姑，即相公，来自“相公”发音的转变，一说“像姑”指相公们长相像姑娘。

[27]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92 页。

[28] 暗示同性恋的肛交行为。

[29] 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 30。

[30] 《闽都别记》真实反映了福建的同性恋现象，古代福建同性恋风气较盛，以致同性恋被称为“南风”。有诗曰：“并蒂芙蓉连理枝，谁云草木让情痴？人间果有南风树，不到闽天那得知。”此诗出自李渔《无声戏》外编卷之五。

[31] 〔美〕穆尔顿·亨特：《情爱自然史》，赵跃、李建先译，作家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8 页。

[32] 英国导演德·贾曼（Derek Jarman）根据卡拉瓦乔的经历摄制了电影《卡拉瓦乔》，又名《浮世绘》（1986）。

[33] 1987 年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把它改编成同名

电影，主演詹姆斯·威尔比（James Wilby）、休·格兰特（Hugh Grant），获得第44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最佳影片银狮奖。

[34]转引自矛锋：《人类情感的一面镜子——同性恋文学》，台湾笙易有限公司文化事业部，2000年版，第245页。

[35] David Steigerwald, The Sixties and the End of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1995, p173.

[36] （英）约翰·希尔（John Hill）和帕梅拉·彻奇·吉伯森（Pamela Church Gibson）：《牛津电影研究导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37] （美）阿瑟·莱尼格：《美国电影审查史》，载（美）托马斯·R阿特金斯：《西方电影中的性问题》，郝一匡、徐建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38]瑞典导演，代表作有《阿尔纳宝藏》（1919）、《走向幸福》（1920）、《戈斯达传》（1924），是电影明星嘉宝钟爱的启蒙导演。

[39] Richard Dyer, Now You See It,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p8.

[40] Richard Dyer, Now You See It,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p63.

[41] Richard Dyer, Now You See It,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p201.

[42] Richard Dyer, Now You See It,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p277.

[43] （美）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李银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